

观点

征了美人税,你就是“美人”?

■于森

日本电视剧《世界奇妙物语 2016 春季特别篇》里讲述了一个关于美人税的故事,女主人公爱子是个美女,因此在职场上处处春风得意,然而政府认为这样有碍竞争公平,就针对性地征收了美人税。

女主在经历了开始的不适应后,逐渐接纳这种税种。然而,在同为美女的母亲去世后,不但拿不到遗产还要交税,这使得她不堪忍受并通过装丑来降低税率,结果被以偷税漏税的罪名起诉而入狱。监狱里,女主最终认识到心灵美才是重要的。不久,女主出狱后发现自己不用交税了,因为她已经成为“丑女”了。

这个故事其实也是有研究基础的,外观的颜值会给人一致的印象,那么你看到的颜值一致的人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两位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考察了1984年到2009年间澳大利亚人口中外貌的影响后发现,更漂亮的人不仅在职场上会受益,整个家庭收入也会提高。同时他们也发现在这25年间,这个影响几乎是稳定的。

如果澳大利亚的考察结果可以推广的话,我们就知道一个现实:类似外貌的天赋对于个人的事业家庭发展是有助益的。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社会失衡,一个很自然的想法就是对他们征税。

我还想强调的是第二个研究结论,那就是这个影响会不会继续稳定下去,如果不够稳定,那么也没有太大的必要进行外部干预。

最可能对外貌优势产生影响的其实就是人工智能。很多人担心人工智能会产生意识取代人类,这个我不做评价,但眼下看得到的却是人工智能会影响定价策略。



简单地说,如果你经常在网上活动,那么你看到的价格将受你网上行为记录的影响,天天看宝马奔驰的人买机票价格就基本没啥折扣,而天天搜青旅的人则可以看到更低的折扣。也许你说,我新注册一个用户或者清除缓存不就可以了——5年前可以这么做,现在已经没用了。

只要你是一个互联网重度用户,你的设备、经常登录的IP所代表的地点、常用邮箱或ID、打字习惯、浏览习惯等都可以用来追踪到你。目前就有这样的公司,号称掌握千万甚至亿级用户的唯一标志符,其服务对象多半是互联网电商,当然也有非营利机构。只要你在产生互联网数据,就有办法对你进行画像与归类,然后定向营销。

这种所谓个性化的服务其实本质上都是在发掘现金流,调动并满足你的需求。看起来像是双赢,你很快找到你想要的东西而商家很快找到顾客,但实际上很快你就会有电视剧中爱子的那种感觉,那就是钱越花越多而收获到的东西大体是所谓的潮流吧。

更尴尬的是你根本就不可能逃离这个循环,当你缺钱时,你的互联网记录会告诉银行,这个人没钱了,而算法也会通知你借钱,这个钱快破产了,风险角度不要借钱,然后它就会推P2P或高息信贷了,相信你还是会觉得这个算法很贴心的。等到这个人真正破产,就会成为算法忽略的那一部分“互联网流浪汉”,此时互联网已经不再让你互联网接受“免费”且“贴心”的服务了。

相比所谓人工智能控制人类,市场借助人工智能控制人类更可怕也更具有可行性,因为这会实实在在地创造利润并被各大互联网公司追逐。所谓的电商、金融、政府如果都进行充分的信息流通,那么,一个可预计的后果就是过往构建算法的经验知识将成为真正统治互联网的规则。那些社会上不可明说的规矩,例如有房才结婚、女性要持家、喝红酒有品味、练毛笔字有文化……都会被算法捕捉用来训练自己的模式。

基于经验构建的算法不会考虑反馈,但反馈的效果却会用来继续强化算法,这样的商业市场社会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喜欢,但目前正在形成。天赋也好,努力也罢,很多原来根本不会有人去思考的行为模式只要形成规模产生效益就可能被人工智能放大并用牟利,此时旧有的基于非互联网模式产生的道德与伦理都可能变得不再稳定。

所谓的知识经济是假的,是少数人圈钱“自嗨”忽悠出来的概念。这两年教人成功的人比真正成功的人多,他们传播着

各种“消费升级”的理念,其本质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算法,把经验固化成教条。但其实知识这东西从来都不是听着摘要与结论就能掌握的,因为这些人很少让你自己去思考问题,而是通过论文、权威著作与亲身经历生把一些东西压给读者,而且还收费。这就像是另一种包装过的人生应试教育,而且还通过收费来强调“花了钱才会学”,这招你在健身房没见过?

数据都是很诚实的,你去看看那些订过车的专栏,再看看里面的文章阅读量,就能知道大概有多少人只是通过购买这种仪式感来忽悠自己了。一年以后,也许会有各种优惠让你继续这种仪式感,你不过是在付费买罪。

在我看来,真正学到知识只有通过不断思考这一条路径,如果在这个知识经济喧嚣的时候,你从中体会到了乐趣,那付费是合适的,如果没有,最好别让那些卖人生经验的去持续干扰你构建自己的人生经验。毕竟这只是风潮,过后冷静下来你还是会得学会面对是你,他是他的现实。

知识经济的伪称就在这本质上还是一种营销,引导你的愿望并告诉你这玩意儿有用、有意思,通过你的消费来告诉你,你的选择是对的并不断加强,然后等你发觉这是虚幻时它又去忽悠下一批了。有用也好,无意思也罢,都应该你自己说了算,而不是大V、人工智能算法说了算。好比被收了美人税的爱子感到的身份认同,现实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沉浸其中,殊不知美国规则都是可以摆布的。

我不是在写科幻。
(<http://blog.sciencenet.cn/u/yufree>)

“人才帽子”要戴也要摘

■罗民

《晏子春秋》中有段令人颇为诧异费解的故事:二桃杀三士,当时读来,不觉心中有块垒焉。三子为争桃而死,实在匪夷所思;晏子纵得逞,然其行君子所不为。今遍观全国各地之人才项目,似隐有所感悟。

只要拿到了“人才帽子”,就能名利双收、高枕无忧。但现实却是人才多而“帽子”少,故不能人人皆有“帽子”可戴。到底谁能戴“帽子”,或许只能计“论文篇数和影响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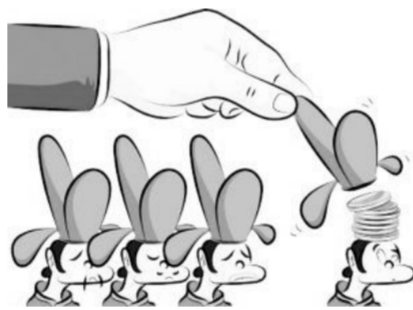
《诗经·关雎》有云:“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这人才“帽子”也如同“淑女”一般诱人,求之不得,势必难以安枕。

故事中的公孙接是个急性子的人,不受桃,是无勇也。正如是“人才”而不勇于申请“帽子”,也是不思进取的表现。于是公孙接抢着述说自己的功绩之功后取桃而食,接着古冶子讲述了自己在河中大杀青蛇、勇救君主的事迹后也拿起一颗桃子。正如有些人才,生性率真性急,一看各种人才“帽子”就急于争抢,终日

忙于填写表格、准备证明材料、装订成册、到处找人推荐签字而后打印上交。虽身在教学与研究之列,却终日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时时以为有“鸿鹄”将至,可戴“帽子”而奈列“高层次人才”。

再说另一个人田开疆,他本来不好意思争抢桃子,但是别人论功而抢桃,实在让他面子上挂不住了。现实中有很多人才颇为清高,矜持而处事低调。正如杨绛所言:“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但是渐渐地感觉苗头不对,争上“帽子”的不仅得了荣誉和名声,而且占据了大量的资源和人脉,看着人家早已“轻舟已过万重山”,而自己却“山重水复疑无路”,于是也不由自主地争抢了起来。

结果是,当田开疆述说自己多次勇退敌军、有开疆扩土之功后,公孙接和古冶子感到自己的功劳比不上别人,却贪功取桃,两人因此羞愧自杀。反过来田开疆看到两人因自己争抢而亡,自己独有是谓不仁;羞辱别人、夸夸其谈是谓不义,于是乎引颈而亡。今人不比古人,古人崇尚“仁义忠



勇”,就能知耻而后勇。今人多自以为胜过他人,不择手段而取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些戴上“帽子”的人,终日沾沾自喜,固步自封。反正“帽子”只要戴上了就没人管了,虽然年年也评估考核一下,但从从来没有听说过谁的帽子戴上了又被摘下来了,只“上”不“下”,“帽子”只“戴”不“摘”的人才项目管理机制让人勇于“抢帽子”,却不履行“戴帽子”的责任和义务。“帽子”戴多了,以为“帽子”就是功劳成绩,于是“逢帽必抢”,理直气壮,不遑多让。没有戴上“帽子”的人,尽管开始

和那些戴上“帽子”的没有多大的差距,可是到了年纪还戴不上“帽子”就意味着学术失败,于是早早起了退隐之心,过早地抛下科研,放弃初心,渐渐流于“撞钟”度日的境地。

自古人才难得,数十寒暑方树人,为国惜才,当用良策。天下人才济济,资质品行不同,学问专业各异,学术发展有快慢之别,岂可皆以论文篇数或影响因子而论之?既然高校以师资聘之,授之以教鞭,奈何以“人才帽子”辱之?使极少数人得“帽子”而挂败众人上进之心,实伤天下人才之念。与其如此,不如严把教鞭之关,只让有充足资质之人入聘教职,既聘之即给予充分资助,期之以固定年限,然后评定所决其去留,此国外“tenure”终身教职聘任制度也。或者由大学分类聘任教学科研人员,给予其固定资助,协商考核年限,到期考核评定其去留。如此优胜劣汰,则人无怨言,国家选贤用人,尽其才,各安其位。

(<http://blog.sciencenet.cn/u/martintluomin>)

科学家马勒:一位积极的“入世”者

■邵鹏



再过几天——4月5日,就是科学家、194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赫曼·约瑟夫·马勒(1890—1967)逝世五十周年。

在读姆萨吉博士的《基因》一书时,了解了马勒一些有趣的故事。于是我寻找他的资料,发现除了学术贡献,马勒一生丰富、有趣的经历也令人难忘。让我联想到中文里“入世”这个词。

马勒是位积极“入世”的科学家。他生于纽约,本科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有幸在生物学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生物学家、遗传学家托马斯·亨特·摩根实验

室,以非正式身份参与了两年的研究工作。摩根在哥伦比亚的实验室被称为“苍蝇实验室”(the fly lab)。摩根带领一帮研究生利用果蝇研究遗传变异。他手下几个主要的学生的名字日后都被写进了教科书及科学史,这其中也包括马勒。

马勒后来在“苍蝇实验室”与摩根就论文的署名问题产生了分歧,仓促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转赴位于得克萨斯州的莱斯大学工作,1920年至1932年间于得克萨斯大学任教。马勒的主要学术贡献始于1926年。此时已经36岁的他发现了X射线能够导致果蝇的基因突变。在于德国举办的国际会议(第五届国际遗传学会议)上发表了发现之后,马勒声名鹊起,成为知名学者。此后,他不遗余力地鼓吹放射线对于人类健康的潜在威胁。此后,马勒度过了学术及人生双重意义上的寒冬。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让马勒对于资本主义的前途十分失望。屋漏偏逢连阴雨,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社会主义者,马勒帮助编辑和发行的左翼报纸 Spark 使他遭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而此时,他的婚姻也遭遇了危机,与导师摩根以及其他同窗本就不太融洽的关系降至前所未有的冰点。马勒选择了自杀,但所幸未遂。

1932年的冬天,马勒搬到了柏林,开始在 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工作。但是德国的政治氛围以及“科学”研究,让马勒再次失望,而且越来越反感。1933年,马勒和妻子及儿子搬到了苏联列宁格勒,投入了另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怀抱,在这里进行了遗传学研究所工作。1934年,这个研究所搬到了莫斯科。马勒在苏联领导一个规模可观且十分多产的实验室。但是,苏联的政治氛围以及由此导致的正常学术研究受到的无厌干扰,让马勒又一次陷入深深的失望,最后被迫离开苏联。

此后的几年间,马勒带着他的“果蝇”辗转于欧洲各处:先后在马德里、巴黎、爱丁堡等地工作。1940年,他最终回到了阔别了8年之久的美国,接受了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附近的阿默斯特学院的一个研究职位。这个职位不是终身教职序列的。更有意思的是,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前的一年,该学院终止了他的雇佣合同。随后他在印第安纳大学动物学系谋得了一个副教授职位,并在印第安纳大学度过了作为一个科学家能享受的充实、多产的岁月。马勒获诺贝尔奖是基于“发现了X

线可以导致突变”。此后,基因的物理学及生理学本质,成为了生物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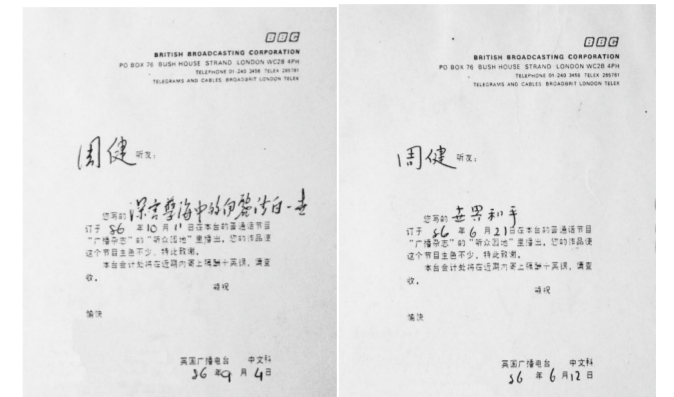
同时,马勒继续投身社会活动——他不遗余力地宣传核技术对人类健康的潜在威胁;冷战中,他支持禁止在海上及空中核试验;作为遗传学家,他认为政府常常利用人们应该为自己的孩子选择“基因”的权利——通过收养、人工授精、卵子捐献等手段。

马勒不但积极参与社会上关于这些话题的讨论甚至辩论,还鼓励他的学生们参与这样的讨论。他认为政府常常利用“想当然”的思维,忽视或者拒绝承认科学的发现。因此,讨论科学比民主更有意义。

马勒一生,经历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美国、纳粹逐渐掌握的德国、已经形成世界一极的苏联,最终又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没有突出的传奇性故事,他和我们一样,是活生生有尊严也有苦恼的普通人。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位非常纯粹的、积极“入世”的、闪烁着人格魅力的科学家。

(<http://blog.sciencenet.cn/u/PhenixinRocky>)

网罗天下



我的BBC之缘

■周健

事情还是要从30多年以前说起。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那个时代的信息及其传播与当下的情况有着天壤之别。从往就读高中开始,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收听“敌台”,其实就是BBC、美国之音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中文节目。

因为几乎没有学过英文,所以也听不懂英文节目。然而,那些来自境外的信息,关于中国的、世界的,却让我如痴如醉,几乎每天都听,还常常在学校熄灯之后将半导体收音机放在被子下面,躲在被窝里听。每每听到那些熟悉的电台呼号和音乐,就热情高涨、心潮澎湃。时至今日,“这里是伦敦 BBC 广播电台”“This is a voice of America”,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节目中的一个栏目名称:“人约黄昏后,月上柳梢头”等播出语,包括其节奏、音质、音色都留存我的记忆之中。

直到工作数年之后,我依旧保持着收听这些电台的习惯。1986年上半年的某一天,从BBC中文节目中听到一则征文启事,主题是关于“世界和平”的,内容不限,字数有限,好像是几百字的要求,录用文章将在“听众园地”栏目中播出。

我思量一番之后,写就了一则短文,从邮局买来一个国际信封(那时候邮局卖信封是分类的),将稿子寄了出去。短文的原稿早已遗失,只记得文中主要阐述的观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投稿。

不知过了多久,一天快递员送来一封国际邮件,邮件的翻译人员在信封上用中文写了我当时所工作的机关名称,那是一个中国内陆县人民政府的卫生局,机关工作人员很少,也没有与我同姓同名的,因为这个信封上的收件人只有两个字的汉语拼音。我看了看信封的透明窗口内的文字,“BBC”三个字蹦进眼帘,于是猜想是关于我给他们投稿的事,拆开信封一看,信是中文写的,告诉我投稿被接受了。真还有些意外,这让我很高兴了一阵子。

BBC的来信告诉了播出日期,于是准备好卡式收录机,专门去买了一盒索尼录音磁带,到节目播出的时候,便将其录了下来。这盒磁带保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因为搬家才弄丢了。

节目播出后的一段时间,快递员再次送来一封国际邮件,从信封上看和上次邮件差不多,打开一看,是一张支票。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见外国的支票,从银行兑换出来几十元人民币,印象中比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还要多。又过了几个月,BBC还播出了我写的一则读书笔记《深宫孽海中伊丽莎白一世》。

这就是我的“BBC之缘”。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30多年过去了,往昔那些曾经触动过心灵的岁月故事,依旧历历在目。
(<http://blog.sciencenet.cn/u/j6789>)

定价“0.04分”的一本书

■郭向云

周末,我在太原南宫逛旧货市场时,看到一本旧书——《加有标记的》原书,作者是苏联人。看书名,应该是一本物理学有关的科普书。书的纸张已经泛黄,看上去有些年头了,但是封面、封底保存还算完整。

我不禁有些好奇,想知道过去的化学知识和现在有什么不同。征得摊主的同意后,我打开包装看了看,书中也没有残缺缺失的页面,就买了下来。

这本书是1950年出版的,封面是横排的,但里面目录和正文却是竖排的。而且,封面上的书名虽然是横排的,却是从右往左读。

中国古代的书最早是写(或刻)在帛和竹筒上的,成书是一卷一卷的,书尾在卷筒的最里面。阅读的时候,拉开书头,竖着从上到下读完一列,再接着读左边的下一列。对简书和帛书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天才的设计。后来有了纸张装订的书,这种古风仍然被习惯性地延续了下来。

新文化运动,西风东渐,一些新派人物开始倡导横排由左向右书写。1950年6月全国政协会议上,陈嘉庚提交了汉字书写统一由左向右横写的提案。1955年1月1日,《光明日报》首次采用横版。第二年元旦,《人民日报》也改成了横版,此后逐渐普及全国。这本书奇怪的排版格式,正是那个时代新旧交替的一种反映。

书很薄,只有区区数十页,可是封底的定价却赫然印着“基价:4.00”。记得我上中学时买的书,大多数都是几毛钱一本。这么薄的书,定价居然4元!

突然想起母亲曾说过,以前1万元旧钱换1元新钱的事。这本书的定价很可能是使用旧货币。1950年的4元钱到底是什么概念呢?

从网上查资料得知,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成立,同日发行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分别为1元、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10000元和50000元。1955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二套人民币,面值分别为1分、2分、5分、1角、2角、5角、1元、2元、3元、5元和10元。这次,还发行了1分、2分和5分的硬币。第一套人民币1万元兑换第二套人民币1元。这么一算,这本书的定价才0.04分,可以说是我书架上最“便宜”的书了。一本薄薄的小书见证了一段历史。看着摆在面前的这本小书,那些被时间长河冲淡的历史,重新在我脑海里变得真切、变得触手可及。
(<http://blog.sciencenet.cn/u/Guoxiangyun>)